

甘肅省
歷史學會論文集

甘 肅 省 歷 史 學 會

一 九 八 二 年

出 版 说 明

省史学会自1978年11月重建以来，截止1981年底，已举行过三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对会员提交的论文，按不同问题分组进行讨论，以求集思广益，交流心得。1979年提出的论文有三十四篇；1980年也是三十四篇，并将其中之十四篇选入1980年论文集印行；1981年为五十四篇，经理事会研究，决定将其中之二十八篇选入1981年论文集。而全部五十四篇之论文题目，则仍在论文集中附载。在每次年会中，为使全体会员了解并参与当年全国性的史学活动，均曾确定某个全国正在开展研究或讨论的问题为重点，并事先在会员中组稿。为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年会即以辛亥革命问题为讨论之重点，并将与该重点有关的九篇论文列于前面，而其余论文则按古今中外历史顺序排列。在历次年会中，世界史方面的论文偏少，深望今后有所改变。

论文集的印刷得到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委员会、酒泉钢铁公司印刷厂的大力资助和热情支持，理事会表示衷心感谢！

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会

1982.7.

甘 肃 省 历 史 学 会

通 知

甘肃省历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经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席省历史学会82年年会代表的反复酝酿讨论，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分项民主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现将选举结果及理事名单通知如下：

顾 问：陆为公（省政协）

会 长：金宝祥（西北师院历史系）

副 会 长：赵俪生（兰州大学历史系）

李 光（省社会科学院）

张培德（西北师院历史系）

秘 书 长：张培德（兼）

副秘书长：胡斯振（西北民院历史系）

周恩棠（兰州一中）

刘光华（兰州大学历史系）

张学正（省博物馆）

理 事：（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杰（兰州十一中）

王希川（七局一中）

刘熊祥（西北师院历史系）

陈守忠（西北师院历史系）

李天祐（兰州大学历史系）

汤季芳（兰州大学历史系）

何玉畴（兰州大学历史系）

刘少萱（西北师院政治系）

李仲立（庆阳师专历史科）

周丕显（省图书馆）

杨生华（省政协）

和 恭（兰州二十二中）

洪聚棠（西北师院历史系）

贺世哲（敦煌文物研究所）

饶以诚（西北民院历史系）

郭维仪（省委党校党史组）

秦明智（省博物馆）

联系地点：西北师院 历史系 转 省历史学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 录

一九八一年年会论文目录.....	(1)
------------------	-------

论 文 选 登

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环境和条件，防止悲剧重演——学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点体会.....	郭维仪 秦化顺 (3)
辛亥革命前后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刘熊祥 (9)
立宪派与粤汉路权的收回自办斗争.....	何玉畴 (36)
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与改良主义.....	王 劲 关连吉 (54)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帝国主义在甘宁青的侵略活动.....	赵艳林 (65)
甘肃咨议局及其演变.....	赵颂尧 (74)
论辛亥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	
——华侨是辛亥革命之母.....	丘少伟 (86)
沙皇俄国对辛亥革命的破坏.....	饶以诚 (96)
辛亥革命在甘肃.....	王公望 (103)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	郭卿友 (122)
《左传选》注释管见.....	张孟伦 (129)
从《云梦秦简》中看秦国的所有制关系	
——兼论秦朝速亡的原因.....	曹怀玉 (139)
政论家贾谊.....	张大可 (144)
伊斯兰教传入甘肃及其发展.....	张淡云 (148)
维吾尔族族源问题札记.....	张 炼 (153)
敦煌三界寺.....	孙修身 (173)
扩廓帖木儿(王保保).....	胡斯振 (184)
论明代军屯的性质与作用.....	唐景绅 (191)
顾炎武传.....	路志霄 (206)
查继佐与《罪惟录》.....	赵 莼 (211)
再论统治新疆时期的杨增新.....	朱允兴 (214)
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历史概述.....	李 光 (223)
湘南暴动的回忆.....	李克如 (246)
陇东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潘富盈 王德孝 (263)

董振堂将军英名永在

——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许宪章 (276)

试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李仲立 高文 (281)

丛德滋同志传略.....范圣予 (288)

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哪里?

——对斯大林一个提法的探讨.....洪聚棠 (299)

一九八一年年会论文目录

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	论文题目
张孟伦	兰州大学	《左传选》注释管见
张孟伦	兰州大学	评嵇文甫先生两本评价历史问题的著作
张大可	兰州大学	政论家贾谊
张大可	兰州大学	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建元元年不容置疑
张大可	兰州大学	略论东汉钩党之狱
李 蔚 汤开键	兰州大学	论喻廌罗政权兴起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
唐景绅	兰州大学	论明代军屯的性质与作用(初稿)
王 劲 关连吉	兰州大学	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与改良主义
杨定名	兰州大学	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排满”口号
何玉畴	兰州大学	立宪派与粤汉路权的收回自办斗争
朱永兴	兰州大学	再论统治新疆时期的杨增新
郑 文	西北师院	读《楚辞·惜誓》
陈守忠 王宗元	西北师院	甘肃境内秦长城遗址调查及考证
王 楷	临洮博物馆	从《云梦秦简》中看秦国的所有制关系
曹怀玉	西北师院	——兼论秦朝速亡的原因
牛得权	西北师院	汉代军事家赵充国
唐 凌	西北师院	试论司马迁的史学成就
刘曼春	西北师院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
赵向群	西北师院	前凉政权初探
张淡云	西北师院	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
张淡云	西北师院	伊斯兰传入甘肃及其发展
路志霄	西北师院	顾炎武传
赵 荧	西北师院	查继佐与《罪惟录》
路志霄	西北师院	甘肃近代诗人小传
王干一	兰州教师进修学院	辛亥革命前后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与孙中山
刘熊祥	西北师院	的民生主义
赵艳林	西北师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帝国主义在甘宁青的侵略
		活动
赵颂尧	西北师院	甘肃咨议局及其演变

丘少伟	西北师院	论辛亥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 ——华侨是辛亥革命之母
张海生	西北师院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述略
许宪章	西北师院	董振堂将军英名永在 ——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
西北师院政治系党史教研室		陇东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潘富盈 王德孝	西北师院	陇东根据地革命斗争简史
路志霄	西北师院	程步瀛及其诗评
王千一	兰州教师进修学院	丛德滋同志传略
范圣予	西北师院	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哪里？——对斯大林的一个提法的探讨
洪聚棠	西北师院	《古代罗斯公社》（译文）
马英昌	西北师院	罗塔尔——哈拉帕文明的门户（译文）
范 卡	西北师院	略述唐代回纥与汉族关系
张玉峰	西北民院	维吾尔族族源问题札记
张 炼	西北民院	扩廓帖木儿（王保保）
胡斯振	西北民院	试论孙中山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辩证关系
郝玉屏 贾东海	西北民院	沙皇俄国对辛亥革命的破坏
饶以诚	西北民院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
郭卿友	西北民院	论巴枯宁集团的出现和覆灭兼驳苏联学者对巴枯宁的评价
贾东海 谭秉顺	西北民院	中国的蒙古研究（译文）
车得骊 胡斯振	西北民院	农村公社和井田制 ——兼论西周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李仲立	庆阳师专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
李仲立	庆阳师专	试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
李仲立 高 文	庆阳师专	敦煌三界寺
孙修身	敦煌文物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历史概述
李 光	省社会科学院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辛亥革命在甘肃
王公望	兰石厂中学	辛亥革命时期酒泉人民的革命斗争
何端中	酒泉中学	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环境和条件
郭维仪 秦化顺	省委党校	防止悲剧重演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点体会
李克如	省人大常委会	三年解放战争发展情况的介绍

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 环境和条件，防止悲剧重演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点体会

郭维仪 秦化顺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的悲剧已经结束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如何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环境和条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止悲剧重演，是我们学习宣传《决议》的重要任务之一。

有人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仅仅归咎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领导。这种观点是既不全面也不科学的。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领导有直接的联系。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发生的。恩格斯在分析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时指出：“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01页）因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43页）因此，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不应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和条件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找出防止重犯类似错误的可靠途径。

“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产物。而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产生和发展，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出现的。新的历史时期，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由于我们党是在长期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对新时期中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种新形势、新特点认识不足；对于人民群众中大量存在和出现的各种思想认识与不同议论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处理社会主义中种种社会政治矛盾还缺乏经验，这就很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

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把大量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作阶级斗争问题。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把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认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上升到主要的决定的地位;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而且还错误地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就使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明显地指向党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所谓“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阶级斗争的主要战场在党内,党内的这场斗争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党要“变修”,国要“变色”。这就使得“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很难避免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还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削弱和破坏。而民主集中制所以遭到破坏又是同我们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相联系的。正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一系列辉煌胜利面前,在国内外一片赞扬声中,党在指导思想开始滋长了主观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因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党的集体领导,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逐渐发展起来。而林彪、康生、江青一伙野心家认为有机可乘,便借题发挥,大肆宣扬个人崇拜,硬把毛泽东同志当作“神”来颂扬。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作风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这种作风的滋长泛滥,又是同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对我们党的严重影响分不开的。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党领导人民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坚决地、彻底地斗争,但封建意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肃清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迷信思想、特权思想是不可能象人死了一样,装进棺材,埋入地下就完事的,它还会腐烂发臭,毒化人们。尤其是建国后,我们注意了经济制度的变革,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封建意识的批判,致使宗法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等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和领袖。同时,我国原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所决定,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希望有人“保佑”、有人恩赐,幻想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容易产生崇拜个人。当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求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之后,他们对党和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是真挚深厚的。而毛泽东同志就成了他们心目中最崇拜的“神”。虽然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神”已被人所冲破,小生产也不再是原来的小生产,但是“神”的影响和小生产的习气仍然存在。当野心家打着维护领袖权威的幌子,搞个人崇拜时,他们就很容易接受。由于以上种种影响,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现象滋长泛滥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除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处理领袖与党的关系而出现的严重偏差,不能不对我们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起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到列宁以后,曾错误地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强调领袖对党、阶级、群众的领导作用,忽视党、阶级、群众对领袖的监督作用。把群众、阶级、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领袖个人。

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绝对服从其领导和指挥，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又要求共产国际组织绝对服从领袖个人，使民主集中制丧失了基础，集中实际上变成了独裁。斯大林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晚年，欣赏个人崇拜，搞个人专断，集党和国家权力于一身，造成了肃反扩大化。我们对此曾做过总结，指出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没有科学地分析这个错误产生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使我们未能吸取深刻的教训，反而接受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重犯了类似的错误，误认为搞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高度集权，集权于中央，进而集权于领袖个人，形成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总之，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滋生和发展，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使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在国际上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影响下，在国内开展所谓“反修防修”的运动，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一个重要条件。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等人反斯大林，否定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他们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企图控制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我们党没有听从他们的指挥棒，毛泽东同志对此据理进行了严肃批判和斗争，赫鲁晓夫集团恼羞成怒，公然背弃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公开挑起中苏论战，恶化两国关系，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虎视眈眈，威胁我国安全，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苏联领导集团对内压迫人民，对外搞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使苏联党和国家变质的这一严酷事实，会不会在我们党和国家出现呢？这是一个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问题。为了防止党和国家异化，毛泽东同志提出要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容易接受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给予正确的解释，使之成为严格的科学概念，而对当时国内形势和党内状况又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把国际范围内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作为反对国际共运中“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机械地、简单地搬到了国内，在国内开展所谓反修防修的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把党内正常的思想分歧和某些错误倾向，甚至正确的意见、批评、建议，误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而且具有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质。为解决党内这些矛盾和斗争，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行的，只有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进行揭露才能解决。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场大悲剧，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那么怎样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重演呢？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须认真研究总结和牢牢记取的。

1. 在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和巩固，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经济文化的落后直接影响了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样的原因，又使我们重“政治”而轻经济，未能辩证的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走进轻视经济建设的危险边缘。这方面无数事实说明，大抓经济建设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党的“八大”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是既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又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的。但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规律认识不足，错误地估计了我国国情和社会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形势，不适当地用政治运动来改变生产关系，并企图通过开展政治运动来发展生产，推动经济建设，这就使我们在长时期内未能实践“八大”所规定的正确路线，没有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集中一切力量扎实、稳妥、高效率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把这一错误推向极端，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提倡“穷过渡”。这完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给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过去所犯的 error，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基于这一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决议》指出：今后，“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就使失败的教训变成了宝贵的经验，指导我们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2. 必须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既反“左”，也反右，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左”和右是离开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倾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先后都出现过，都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党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是在不断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胜利前进的。但自“八大”以后，在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总是表现为反右是无情的、经常的；反“左”是防予性的，是没有多少实际行动的。错误的认为右是立场问题，是反革命的；“左”是方法问题，是革命的；右在“纲”上、“线”上，“帽子”甚多；“左”是好人犯错误，认识了就好。而且我们每开展一项新的工作，又总是从反右入手，扫清所谓思想障碍，所以，人们总觉得“左”保险，右危险，“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我们在“矫枉必须过正”思想的指导下，总是反右过头，反“左”不彻底，反右掩盖“左”，甚至把“左”当右反，使“左”倾错误得以发展。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左”倾错误逐步发展成为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使党在指导思想脱离客观实际，错误地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形势，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结果在政治上，反右派、反右倾、搞“四清”等运动，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在经济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尽快地增加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总量的目标，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用阶级斗争推动生产，急于求成，“左”倾蛮干，未能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逐步升级，党内“左”倾错误逐步膨胀起来，使“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得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外一致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纠正、平反冤假错案，但是我们党内有人仍然很欣赏“左”的一套，坚持“两个凡是”，搞“洋跃进”。三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从党的指导思想上清算了“左”倾错误。就在这时，真正右的思潮又活跃起来，煽动无政府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反右容易产生

“左”，必须注意防“左”，克服“左”的干扰；反“左”容易产生右，必须注意防右，克服右的干扰。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同时，党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在革命顺利发展和取得胜利时，人们头脑最容易发热，昏昏然，产生“左”的倾向；在革命遇到困难和失误时，人们最容易消沉，悲观失望，产生右的倾向。因此，在锣鼓声中，敲“警钟”、泼“冷水”；在掩埋同伴尸体时，指方向，向前看，就显得特别重要。当前，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仍然是我们的任务。但是对于右的干扰，也必须给以坚决地揭露和批判。

3.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领袖和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政党是阶级的先锋队，领袖是政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领袖通过政党组织领导本阶级和其他阶级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发挥他们对历史发展的重要的以至必不可少的作用。忽视或否定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完全错误的。但领袖是人，不是神。领袖是一批人，是一个领导集团，而不只是一个人。领袖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帮助，而不能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为所欲为。历史一再证明，任何领袖人物，总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因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领袖人物的是非功过，既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又不能讳过，搞神化，搞个人崇拜。林彪、“四人帮”颠倒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制造现代迷信，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使人们看到了搞个人崇拜的虚伪性和危险性，开始探索其问题的本质。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肃清个人崇拜的流毒和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却仍然有人对此很感兴趣，不仅维护旧的个人崇拜，而且接受新的个人崇拜。这说明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仍顽固地存在着。因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正确理解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就显得特别重要。

4.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和集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它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高度集中，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认真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这是由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个人专断和集权是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不相容的。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高度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使命。这是极其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需要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包括领袖们）的智慧和经验，充分发挥全党全国人民（包括领袖们）的极大的社会主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保证党和国家的性质不发生变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专断和集权高度发展，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就是极其严重的教训。因此，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认真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特别是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而中央也是集体领导。要防止和克服个人专断和集权，反对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切实保证

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决不允许出现个人凌驾于党和人民群众之上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和国家的命运真正掌握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手里，不致发生异化，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5. 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重演的根本措施。《决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正确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会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左”倾错误，除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而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从而产生了脱离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鉴于这一沉痛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党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不应当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73页）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割裂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从本本和狭隘的经验出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教条化，以至歪曲或误解。其结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而且危害了党的事业，阻碍了理论的发展。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左”、右倾错误的指导，都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作祟。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止、克服和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不良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要善于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正确地去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在新的长征中少受挫折，避免大的失误，不犯或少犯严重错误，从而能够较顺利地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

辛亥革命前后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刘 熊 祥

(一)

首先我们要认识当时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问题提到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来考察。

当时的时代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劳动与资本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原料产地、为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以及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间的矛盾已成为重要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在俄国集中表现出来。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论断后，俄国经过1905年至1907年民主革命的尝试，进一步认识到沙皇封建军事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残酷性；并预见到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必将转变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①

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一次大战期间，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了，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放松了，给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而且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帝国主义对华的包围圈，给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以极大的鼓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是互相支持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担负起政治指导者的任务，走上革命的前线。“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②从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③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特点。

中国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们从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来看，自1901年辛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四、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丑条约以后，一方面由于清朝政府的对外投降，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列强改变对华武力分割政策，而为比较温和的政治、经济侵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虽在不断激化的过程中，但已暂时缓和下来。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加紧对华进行政治经济侵略，他们彼此之间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先是英、美在华的投资竞争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的组成，采取对华联合垄断政策。继而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的称霸东亚及其与俄、英、法的签订密约，互相勾结。列强力图控制清朝政府，使其成为它们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洋人的朝廷”就是当时革命青年对清朝政府的称呼。中国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矛盾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的武装起义与各地农民群众广泛的抗捐抗税斗争汇成为革命的洪流。辛亥革命就是在这一全国规模的革命形势下，推翻清朝统治的。

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本身的软弱无力，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发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致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下，不得不把革命果实让给北洋军阀袁世凯。清朝统治推翻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北洋军阀继续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因此，在中国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统治这一主要矛盾解决之后，中国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矛盾又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孙中山在反袁、护法运动失败之后，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启发。他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才有前途。1924年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线，继续“奋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就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和他提出来的实行“北伐”的政治口号，这就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辛亥革命前后两个阶段发展的特点。

这一时代特点和中国人民主要矛盾，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既要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理想，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把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繁荣富强的中国；又要避免贫富悬殊，重蹈欧美覆辙实行主观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我们必须首先认识清楚的。

(二)

其次，我们要考察中国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与工农业发展的状况，才可据以研究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为解决“民生”问题，而提出来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方案的。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一再指出：“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做方法，这个方法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①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页792。

具体些讲，就是中国工农业生产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十分落后而且发展又很不平衡。中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经济和半封建经济占居统治地位，操纵国计民生，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工业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力量非常薄弱；而广大农业则仍停留在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地位，没有多大改进；且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加深了。

我们先从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的情况来考察。

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怎样呢？我们从资本原始积累和国内市场形成过程来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始终是起着破坏和阻碍作用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已经发生，但直到甲午战争后和日俄战争时，才开始初步的发展。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华经济侵略，除扩大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并加紧对华资本输入，争夺政治借款，经营银行、铁路和工矿企业，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扩大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中，大部分国民财富为外国侵略者所掠夺而去，资本原始积累极端不足，只能在轻工业部门谋发展，无力兴办大规模的工矿企业。且国内市场为外国进口商品和外国在华工矿企业产品所侵占，又压迫着新兴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①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首先是通过战争赔款、政治借款和外贸入超，掠夺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使资本原始积累极端不足，只能经营一些轻工业，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正当欧、美列强加紧对华资本输入，竞争政治借款时，甲午战败，对日赔款二亿两，清朝无力偿付，只有借用外债之一法。列强乘机争夺，清朝大借外债即从此开始。计自：

1895至1900年列强对华借款5440万镑；

1901至1910年又对华借款6750万镑；

1911至1914年袁世凯统治时期，列强对华借款4780万镑；

1915年起段祺瑞统治时期又对华借款1580万镑。

总计此期列强对华政治借款，达一亿八千五百余万镑，按每英镑以十元计算约合国币十一亿元左右，利息尚未计算在内^②，仅就其中1895年后对日赔款借款三亿两与1901年后庚子赔款借款四亿五千万两来看，虽大半是1912年至1934年还本付息的，合计八亿九千五百万两；但在辛亥革命前十五年间仍付本息四亿七千万两以上。^③列强还因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大量对华商品倾销，造成中国外贸的大量入超，每年从中国又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七、驳资产阶级专政。

②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页190—193。

③ 参看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页68—69表二、页74—75表六，页76—77表七。

掠夺一、二亿两货币出口。据统计1901年至1903年间每年（按三年平均数字）对华的外贸入超为一亿六千万元。1909至1911年间每年平均入超为一亿三千万元。^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列强对华商品倾销锐减，但自1911年至1921年间外贸入超仍达十三亿两以上。^②前后二十年间列强通过战争压迫与商品倾销从中国夺去大量货币财富，遂使资本原始积累极端不足，限制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前途。

同时，又由于封建剥削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国内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不仅不能为工业资本创造条件，瓦解旧的生产方式，使其向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反而吸引大量资金向商业和高利贷转移，削弱了工业资本的来源，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列宁分析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时，除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论述：“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是跟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外，并指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得越强烈，工业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就发展得越微弱，反之亦如是。”^③中国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而高利贷资本更为活动。如就1910年银行利息来看，北京为年息6.6—12厘，天津为年息8.4—9.6厘，上海为年息7.2—9.6厘，汉口为年息9.6厘，厦门为年息10—25厘，广州为年息18—36厘。一般讲来，平均利率在12.5—14.8厘之间。^④

银行利息高，势必吸引大量资金向高利贷转移，削减工业资本的来源。因此，中国高利贷资本与工业资本比较起来，前者所占的比例远远大于后者。就1912年全国高利贷（钱庄和典当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来看，前者为16,485万元，后者为5,480万元，二者的百分比为300。即如工业较为发展的直隶，其百分比仍为111，山东为102，江苏为120，广东为372。其他工业不发展的地区，前者与后者的百分比则更高，如奉天（今辽宁）为5102，湖南为1375。^⑤

银行利息高不仅吸引了大量资金向高利贷转移，削减工业资本的来源，而且阻碍工业资本的成长。如在股份公司筹集工业资本的过程中，有所谓“官利”制度，就是受高利贷的影响而形成的。投资人为保证其利润所得，不得低于地租或利息的最低水平，要求股金交付后，企业公司即须按照7—8%至10%的年息，提供“官利”。这一办法，逐渐成为一种不成文的经济法规。公司无论盈亏，都须先付“官利”，盈利有余时，再算红利。如南通大生纱厂在1895至1899年建厂期间，即按年息八厘起息，付出“官利”一万七千余两。崇明大生分厂在1904至1907年建厂期间，也是按年息八厘付给股东“官利”九万一千余两的。^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在这样的资本原始积累极不充足的前提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康梁维新运动与孙中山革命运动的相继兴起，洋务派“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企业既已失败，而外人又取得在华兴办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64。

② 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第一章附表。

③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页139。（曹葆华译本1957年版）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016。

⑤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017。

⑥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011—1013。